

再論建國與專制

胡適

上一期我討論蔣廷黻先生的「革命與專制」，曾提出一個主張，說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要靠獨裁專制。我門現在要討論一個比較更迫切的問題：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不是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呢？

這個問題，並不算是新問題，只是二十多年前新民主黨報和民報討論的「開明專制」問題的舊事重提而已。在那時候，梁任公先生曾下定義如下：

發表其權力於形式，以束縛人一部分之自由，謂之制。專制者，一國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於被制者之外，而專斷以規定國家機關之行動者也。由專斷而以不良的形式發表其權力，謂之野蠻專制。由專斷而以良好的形式發表其權力，謂之開明專制。凡專制者以能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之客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飲水室文集，乙丑重編本，卷二十九，頁三五—四一）

現時有些人心目中所懸想的新式專制，大概不過是當年梁任公先生所懸想的那種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標準的開明專制而已。當時梁先生又引日本法學者寬克彥的話，說「開明專制，以發達人民為目的者也」，這和現在一部分人所號召的「訓政」更相近了。所以當時民報社中，有署名「思黃」的，也主張革命之後須先行開明專制。當時孫中山先生還不會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主張，那時他的三期論的第二期還叫做「約法」時期，是立憲期的準備。「思黃」所說，似是指那「約法」時期的開明專制。汪精衛先生在當時雖聲明「與思黃所見稍異」，但他也承認「政權生大變動之後，權力散漫，於是有以立憲為目的，而以開明專制為達此目的之手段者」。這正是後來的「訓政」論。

平心而論，二十多年前，民黨與非民黨都承認開明專制是立憲政治的過渡辦法。梁任公說：

若普通國家則必經過開明專制時代，而此時代不必太長，且不能太長；經過之後，即趨於立憲；此國

家進步之順序也。若經過之從而復退于野蠻專制，

則必生革命。革命之後，再經一度開明專制，乃進

於立憲。故開明專制者，實立憲之過渡也，立憲之

預備也。（同上書，頁五四）

民報裏的「思黃」說：

吾儕以爲欲救中國，惟有與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以開明專制，以爲與民權改民主之預備。

最初之手段則革命也。（同上書，頁八一引）

民報與新民叢報走上一條路線去了。他們所爭的，其實不在開明專制，而在「最初之手段」是不是革命。梁氏希望當日的中國能行開明專制，逐漸過渡到立憲，可以避免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而革命黨人根本上就不承認當日的中國政府有行開明專制的資格，所以他們要先革命。汪精衛說：

論者須知行開明專制者必有二條件：第一則其人必須有非常英傑之才，第二則其人必須爲衆所推戴。

如法之拿破崙第一，普之腓力特列第二，是其例也

（汪氏全文引見同上書，卷三十，頁三五—五八。

此語在頁四七）。

當日的政府確然沒有這些條件，所以辛亥革命起來之後，

梁任公作文論「新中國建設問題」，也不能不承認：

吾蓋誤矣！……民之所厭，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

居！（同上書，卷三四，頁十五）

這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政論之爭，是值得我們今日的回憶的。二十多年以來，種族革命是過去了，政治革命也闖了二十二年，國民黨的訓政也訓了五六年了。當年反對革命而主張開明專制的人，早已放棄他的主張了。現在夢想一種新式專制的人，多數是在早一個時期曾經贊成革命，或者竟是實行革命的人。這個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驟變，也是時代變遷的一種結果。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憲是最令人欽羨的政治制度。十幾年來，人心大變了：議會政治成了資本主義的副產，專政與獨裁忽然大時髦了。有些學者，雖然不全是羨慕蘇俄與意大利的專制政治的成績，至少也是感覺到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國將來試行民主憲政的無望，所以也不免對於那不曾試過的開明專制抱着無窮的期望。還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倣蘇俄的一階級專政，或者意大利的一黨專政。他們心目中的開明專制已不像二十多年前新民叢報時代那樣的簡單了。現在人所謂專制，至少有三個方式：一是領袖的獨裁，二是一黨的專政，三是一階級的專政。（最近美國總統

的獨裁，是由國會暫時授予總統特權，其期限有定，其權力也有限制，那是吾國今日主張專制者所不屑採取的。）其間也有混合的方式：如國民黨的民主集權的口號是第二式；如藍衣社的擁戴社長制則是領袖獨裁而不廢一黨專政；如共產黨則是要一階級專政，而專政者仍是那個階級中的一個有組織的黨。

我個人是反對這種種專制的。我所以反對的理由，約有這幾項：

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二十多年前，民報駁新民叢報說：

開明專制者，待其人而後行。

雖然過了二十多年，這句老話還有時效。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國民需要較高的知識程度，他們不知道專制訓政更需要特別高明的天才與知識。孔子在二千四百多年前曾告訴他的國君說：「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今日夢想開明專制的人，都只是不知道爲君之難，不知道專制訓政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拿破侖與腓力特別固然是非常傑出的人才，列寧與斯塔林也是富有學問經驗的天才。俄國共產黨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百餘年中無數次開明教育訓練出來

的。就是意大利的專制也不是偶然發生的；我們不要忘了那個小小的半島上有幾千個世間最古的大學，其中有幾個大學是有近千年的光榮歷史的。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決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今日的領袖，無論是那一黨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說是我們的「眼中人物」；而我們無論如何寬恕，總看不出何處有一個够資格的「諸葛亮」，也看不出何處有十萬五萬受過現代教育與訓練的人才可做我們專政的「諸葛亮」。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日夢想一種新式專制爲建國的方法的人，好有一比，比五代時後唐明宗的每夜焚香告天，願天早生聖人以安中國！

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我們試看蘇俄，土耳其，意大利，德意志的專政歷史，人才之外，還須有一個富於麻醉性的熱烈問題，可以煽動全國人心，可以抓住全國少年的熱血與忠心，才可以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基礎。中國這幾十年中，排滿的口號過去了，護法

的問題過去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過去了，甚至於「抗

日救國」的口號也還只够引起一年多的熱心。那一個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國問題還不能團結一個當國的政黨，還不能團結一個分裂的國家，這是最可痛心的教訓。這兩年的絕大的困難與國恥還不够號召全國的團結，難道我們還能妄想抬出一個蔣介石，或者別個蔣介石來做一個新的全國大結合的中心嗎？近年也有人時時提到一個「共同信仰」的必要，但是在這個老於世故的民族裏，什麼口號都看得破，什麼魔力都魔不動，雖有莫索里尼，雖有希忒拉，雖有列寧杜洛司基，又有什麼幻術可施呢？

第三，我有一個很狂妄的僻見：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向來崇拜議會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說那是人類政治天才的最高發明；向來攻擊議會政治的人，又說他是私有資本制度的附屬品；這都是不合歷史事實的評判。我們看慣了英美國會與地方議會裏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認那種制度是很幼稚的，那種人才也都是很平凡的。至於說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那更是笑話。照資本主義的自然趨勢，資本主義的社會應該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應該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團」政治，不應該讓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都走到科學工業的

路上去，而剩下一班庸人去統治國家。（柏萊士 B. C. 的「美洲民主國」曾歷數美國大總統之中很少第一流英才，但他不會想到英國的政治領袖也不能比同時別種職業裏的人才；即如名震一世的格蘭斯頓如何可比他同時的流輩如赫胥黎等人？）有許多幼稚民族很早就有民主政治，正不是奇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中國的阿斗固然應該受訓練，中國的諸葛亮也應該多受一點訓練。而我們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憲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學校，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斗。我們小心翼翼地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有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制的機會。這種僻見，好像是戲言，其實是慎重考慮的結果，我認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學者們的思考的。

二十二，十二，十八夜。

工程師的任務

詠霓

(十一月十八日在北洋工學院講演大意略加補充)

我記得有一個故事：康熙帝南巡時，有一次在鎮江山寺遊覽，看見舳艫如織，檣帆相連，江上人數甚多；他問一位寺裏的和尚說：你看那裏有多少人？那位和尚很哲理地答道，我看只有兩個，一個爲名，一個爲利。

我們也可學那位和尚的腔調，說中國人向來只有二種人，第一種與第二種。第一種人，就是讀書人，就是士大夫。那一種人從來是五穀不分，出門不能辨別東西南北，走三里路便要喘氣的。但是他們自有他們的本事。在從前——沒有與西洋文明接觸以前——他們的本事是能夠讀四書五經，更好的能夠讀諸子百家。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中國最早的文章，却也是相當的根據事實，從實際經驗上寫出來的，所以的確值得研究，他們所包蘊的意義到今天還沒有研究定，還值得我們去用功。但大多數老讀書人往往不去搜索書上實際的意義，而只在做文字的工夫，所以讀來讀去只在這幾本破書，即使有所著作，汗牛充棟，也不過把這本書上的東西搬到那本書上，搬來搬去很不易搬出

新的光明。我想中國老式教育——讀書做文章——唯一的好處，只在叫人稍稍能够整理思想，說起話來還像一句話。但實在不易從書上得到實際的知識。除非少數天才能够跳出文字的牢籠。

自從西洋文化運到我們不能不接受之後，我們便廢科舉，開學堂，拋了四書五經來讀外國的 Text books。不幸，讀的書雖然不同，而讀的方法往往相去無幾。因此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學生的程度愈高，與實際社會也相離愈遠。學校內讀完了教科書還沒有工夫到實地上去印證去應用，立刻又拿了那教科書去教別人。如此輾轉相傳，讀書與實際工作也愈去愈遠。要給這種情形找一個實例，我們只要想學探礦的學生，假使讀完了葛利普的本地地質學教科書，再加上他的二本中國地質史，腦筋裏充滿了背出角滿身長刺怪動物的想像，背得出寒武紀海進志留紀海退一萬萬年以前的古地理圖，書固然讀得不錯了，但是從來不做一次好好的地質旅行，沒有看見過一塊磁鐵礦，不能分別一個接觸鐵礦與水成鐵床，這樣知識問是否有用。

幸而我們還有第二種人，就是不是讀書出身的老百姓，非知識階級。如果只從第一種人看，我們幾乎要想中國人是世界上極無用極無能的民族。試想國內國外大學內學機械畢業的有多少，其中有幾位會開機器廠，自造機器。用十分的力去學，却只拿一分力去用。幸而有第二種人足以證明中國人的能力。即就做機器說，天津便有不少鐵工廠，他們能做很好的鍋爐水泵等，我在河北山西許多煤礦裏都看見天津出的機器，我在四川都看見由天津買去的鍋爐，都說是價廉物美。但這是誰做的呢，天津許多鐵工廠裏面很少有大學專門畢業的技師，這許多機器都是沒有讀過教科書的技工從實地經驗上學來的工頭做出來的。

諸如此類，現在不是有許多人說是爲國防大計要辦酒精廠麼？今天一條陳，明天一計畫，到現在還只有一個酒精廠在漢口，還是法國人辦的。但我還記得六年前在黑龍江省大黑河附近，我曾親見一個資本技術完全中國人辦的酒精廠，機器設備十分講究，不過那位中國人字却識得不多，他是從俄國工廠得來的經驗，回國仿辦的。能仿辦便是能力，但他也只算是第二種人啊。

我們在礦言礦，第二種人也有許多貢獻。別的不談，只說江西湖南的錫礦，足稱天下第一的豐富。他的發見，

既不是你們採礦家，也不是我們地質家，乃是在馬來半島開錫礦的華僑礦工，在外國認識了錫礦，回鄉來時偶而發現的。因此我又想到在南洋群島游歷時的感想，儘管說是不平等待遇，中國僑民在社會經濟上還是佔第一等的地位，許多大糖廠橡皮業金雞納廠都是華人辦的。在中國租界裏有許多華人爲外國資本家做工，在外國殖民地內却見許多外國技師事務員爲中國資本家服務。這也見得中國人經營事業的能力不差，但這班事業家也都是第二種人。

因此，是否便可斷定中國人的天然能力本來很好，但都是都被不良的教育斷傷壞了？我想這個結論有一小部份是對的。但也不可一概抹殺，說中國教育完全不良。中國教育實在也有好的地方，所以效果不很良的原因還在乎教育出來的人不能好好的用，不能從實際工作上去磨鍊去發展，而專是從虛文或虛名上去活動，所以成了一種做裝飾品的特殊階級，而且有的時候做裝飾品都不很高明。因爲中國向來把第一種人看得太高了，小學畢業便稱先生，大學畢業便是專家，無論在何國溜了一趟，回來便非做教授不可。得志太早，便不上進。欲望太高，常易灰心。在一種專業上步步上進始終不息的，真如鳳毛麟角不可多見。青年人的進身只靠資格靠名義（靠人情的更不必論），不問

能力，不問成績，當然他們不肯努力工作，不能養成實在的知識和真正的能力了。第二種人却必須多少有些真本領才能吃飯，才能成功，所以天然的能力也就磨鍊出來了。

但是一個國家決不能專靠第二種人工作，而使第一種人完全寄生。尤其是科學發明之後，有許多事第二種人的習故蹈常不識不知的是做不下去了。例如湖南山西的鐵礦是中國從前很大的生產，他的生鐵和鐵器最盛的時代能夠到南洋西到新疆。但是因為一切礦冶都在第二種人手中，二十年來沒有改良進步，老百姓們雖然家世其業努力工作，然而時代不對，新法的鐵又好又賤又多，老法的鐵業便不能維持了。新法開採大的鐵礦，如大冶，宣化，皖南等等，却都是曾受專門教育的地質家或工程師所發見，測量，估定的。新式的化鐵爐煉鋼爐更非讀過專門教科書的專門家來指導不可了。就是開煤礦亦然，有許多人還想開煤礦只要請唐山的把頭或機器師便行。其實只要規模略大一些，讀過教科書的先生們還是省不來的。所以我說中國從前只有二種人，第一種人在紙上做文章，第二種人在實地做工作。彼此幾乎各不相通，說話都彼此聽不懂

，不用說互相幫助。現在却要有第三種人，有知識更能實行，能做工還能研究。這就是你們工程師。工程師要有很高深的學問，但又要是能够把這學問直接應用到實際問題上去。工程師是第一種人，因為他們可以穿上長衫，到專門學會內與博士教授們討論學理，也是第二種人，因為他們也能拿起斧頭，到礦井底下與工人們一起做工。

北洋大學是中國工科學校最老的一個，我雖然只到過二次，但可以說是認識很深的，因為我在各省旅行，到過許多礦廠，從東北的吉林，到西南的四川，差不多到處看見北洋畢業的工程師，這也證明中國的工科教育在生產事業上實已有了相當的貢獻。而且我覺得真正在礦業上工作的，本國畢業的工程師比例的較外國畢業的更多，這即使不證明本國畢業的比外國畢業的更切實用，至少表示本國畢業的更多肯受較低的待遇，做較實在的工作。這便是大好事，因為做事要少拿錢要多就是第一種人的大壞處，你們要做第三種人，便應該以得了學問實際去用為最大目的。在建設新中國途中，你們應該認識你們特別的責任，努力前進。

蘇維埃聯邦之勞働政策

中島仁之助著
朱經霖譯

(一) 緒言

蘇維埃聯邦是人所共曉建設在共產主義秩序之下，企圖實現將來無階級社會的國家，這一層，所謂必須經過勞働階級獨裁的過渡階段，然後纔能完成前項理想的意思，乃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唱道的一點。因此，這種勞働階級獨裁的制度，構成了蘇維埃聯邦的基本特質，同時國家的組織和政策，亦于此有其一切的基調，所以蘇維埃聯邦的勞働者，在法律，政治及社會上，保障着其他任何勞働者所不能享受的特權地位。不但如此，即是從事同一的勞働，因其社會地位並非隸屬勞働階級而係一般的勞働者，故其待遇即不若勞働階級的優厚；尤其是占國內住民大多數的農民，更受非常差別的待遇。此外能與今日勞働階級均當同樣特權的，僅不過限于特殊場合的專門技術家而已。要言之，蘇維埃聯邦的所謂勞働階級，乃是唯一的特權階級，這一點，當我們在考察蘇俄勞働情狀的時候，是必須緊緊牢記的。

蘇維埃聯邦的總人口，依據一九三二年的統計，約共

一六五〇〇萬人，其中三五〇〇萬人居住都市，剩餘的一三〇〇〇萬大多數人口，居住在地方農村。關於勞働或被雇傭登錄名冊的，有一八，一〇八，〇〇〇人，內中五，四一四，〇〇〇人，即屬所謂勞働階級。

(二) 勞働時間

蘇維埃聯邦的勞働時間，一九二八年以前，由國際勞働局規定，還是蹈襲一般資本主義諸國所適用的一日八時間制的原則；但到一九二九年以後，採用了獨特的七時間勞働制。此項七時間制採用的根本動機，一半是由于蘇維埃聯邦反對資本主義諸國以世界不景氣為口實，實施勞働的強化，因而要以短縮勞働時間的實例，誇示勞働階級專政國家的勞働者，是處于如何優越的地位，所以多少含有幾分宣傳的意味。不過此外還有重大的理由，是在于藉此企圖抑止當時增加失業的傾向。總之，此項七時間勞働制的採用，從政治的見地來說，確是非常賢明的措置。勞働時間短縮的結果，蘇維埃聯邦的失業者是看不見的了；不過另一方面生產的發展，却因此受到相當的阻礙。再說當

時能够服從政府法令的，僅是少數大企業而已，所以對於七時間勞働制的採否，在蘇維埃聯邦國內，也似有相當的議論；且其實施的結果，從經濟上立論，也未必就算成功。但是政府爲更求於一年內遞減勞働時間起見，於是創例的採用了一週五日制。如此，短縮勞働時間所生經濟的損失，可以不斷運轉機械的權益來抵補。就業勞働者分別編成六組，其中五組是繼續工作，餘剩的一組，彼此就輪流休息。可是不久，一週五日制，發生許多不便的缺點，因而又改行了一週六日制。爲什麼呢，因爲在一週五日制實施之下，星期日的休假，當然是廢止了，而同時除開列寧紀念日，勞働紀念節，革命紀念日等極少休日之外，諸如其他資本主義諸國含有宗教的乃至國民的意義那些祭日休日之類，概不存在；這種祭日休日過少的缺點，即可以用一週六日制來補救。

三 生產力問題

私的企業，在蘇維埃聯邦，因爲受着極大的限制，所以個人拔萃的動議權很少發動的餘地。一切事業，依據所謂社會主義的原則而規劃，所以像資本主義國家追求利潤那樣生產的剌激，是完全沒有的。於是，爲增加生產力計，不能不于追求利潤之外，另外找一個新的誘致動力。在

新經濟政策實施的當時，私人企業還能在可能範圍內有相當的許可，所以爲增加生產計，希冀發見替代利潤另一新的社會主義的誘因這種企圖，乃是當前頂緊迫的切要問題。該項新的企圖，自從一九二七年所謂劃期的五年計劃實施之後，總算是實現的了。迨一九二九年，前項企圖，更有長足的進步；所謂社會主義的競爭制度云者，即是耳。這種制度，以列寧工場及莫斯科同一工場之間所行的製品生產競爭，肇其端倪。此後，該項競爭制度，漸次形成組織的形態，迨至一九二八—二九年採用所謂工場協定制，更進一步達到了高度的發展。一九三一—三二年實施的工場協定制，包括擴張了的新團體協定在內，以迄於今。這裏，與社會主義的競爭相關聯而應爲特別記載的，即是突擊隊的組織。突擊隊是由從事產業的勞働者中，選出最富有社會主義熱情的精銳分子組織起來的；同時此外又與突擊隊的組織相呼應，編成了各種的「班」。例如：生產促進班，是鞭撻生產步調遲緩的工場，使之奮起追及一般水準效率而設的；作業監視班，是連絡工場內部的各部職工，使之益臻緊密而設的；品質向上班，是志在改良生產物的品質；合理化班，是以促進作業活動合理化爲目的。他如管理班，是監督工場的一般經營，對於諸種改善事項

予以必要的指示。如此，「班」的名稱，雖是各異而互有不同的功用，但是在社會主義產業的內部，極力企圖增進其生產能力這個中心目標上，是彼此完全同出一轍的。在現在蘇維埃聯邦國內，無論是若何的生產機關，沒有不設立突擊隊制度的；統計起來，總數大約超過三百萬。突擊隊員，是蘇俄勞動者中最自覺的活動分子，所以彼等平日常生活上，享受不少物質配給等特殊待遇，并且保持着社會上高級的地位。

在經濟上否認私的動議權和排斥利潤追求的蘇俄聯邦，對於增加生產的誘因，這是當然的要根據與資本主義諸國完全不同的別種基礎，採用獨創的異樣形態。不過，這種新的企圖，究竟幾分達到目的，這是不易斷言的。就是拿實際的成績來說，在某一產業部門，固然突破當初的計劃而示生產的增加，可是于另一其他部門，就遠不若豫定的見效；不過不心而論，突擊隊及「班」的活動，對於蘇俄產業的生產增加上，具有促進的功用，這是不容疑慮的。不過這種增加勞動生產力新的企圖，有如史丹林所說那樣，並沒有獲得充分的效果；因此，蘇維埃聯邦的政府，不能不捉摸一個匹敵資本主義追求產業利潤，增加生產的強力誘因，將其改正而適用於社會主義的產業，這便仍然

是當前的困難問題。這個問題，蘇俄聯邦直到現在，尚未根本解決，並且成了產業上煩惱的種子；不過此次增加生產力的問題，因為新近差別貨銀制的復活，已經見了幾分實際的解決。

四 貨銀工資政策

蘇維埃聯邦勞動者的貨銀，原則上是以貨幣支給的。不過當革命後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時代，曾經有過一時貨銀是以實物支給的。不久，新經濟政策時代出現，貨幣恢復了本來的機能，於是實物給付制度廢棄，以迄於今。貨銀的決定，是根據勞動組合和雇主方面——蘇俄聯邦勞動力雇主的機關，不待說，大部分是國營企業——之間的團體協約；但最低貨銀額，是由勞動人民委員會設定的。據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伊斯維基新聞的報載，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廢止勞動人民委員會，將其機能——包括社會保險的管理——委任勞動組合總評議會，果爾，則今後最低貨銀的設定，當然是歸屬總評議會的掌管。貨銀是全體分成十七等級：即不熟練勞動者是四等級，熟練勞動者是五等級，下級技術家是四等級，高級技術家是四等級。

十七等級標準的貨銀率，如左表：

等級	不熟練勞働者	熟練勞働者	下級技術家	高級技術家
指數	1.0 1.2 1.5 1.8	2.5 2.8 3.1 3.5	4.2 4.6 5.0 5.5	6.7 7.2 8.0
人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上表是一般的標準數字，此外當然隨企業種類，勞働

條件，勞働契約內容等而有若干不同之處。居住蘇俄聯邦都市的一般被僱人數，依最近數年間月份賃銀的平均統計，一九二七年是七四·六盧布，一九二八年是八〇·六盧布，一九二九年是八五·六盧布，一九三〇年是九一·二盧布。產業勞働者每月的平均賃銀，一九二七年是六四·六四盧布，一九二八年是七〇·九四盧布，一九二九年是七七·六五盧布，一九三〇年是八三·三〇盧布，一九三一年下半年以後，是九七·八三盧布，由此觀之，可見蘇俄聯邦的勞働賃銀，數年以來，全體是顯有增加的傾向。誠然此種賃銀的增加，是由于盧布價值的跌落，而係物價騰貴結果的直接反映；不過在蘇俄聯邦，要是單以勞働者各自所得的貨幣賃銀額，來測定其實際的賃銀，這是不得其當的。此外于貨幣賃銀之餘，蘇俄聯邦的勞働者，還在各種社會的福利設施方面，受到附加的價值，名之謂「社會的賃銀」。此種社會的福利設施，主要的有靜養所，避暑地等是。投于此等設施的金額，單是一九三一年度，幾達

九六〇〇萬盧布；同年靜養所の利用者，計有七九〇·四〇〇人，避暑地的利用者，計有一一〇〇〇〇〇人。前項數字，到次年一躍而增加為一·三三三·〇〇〇人及一八七·六〇〇人；此等利用者中，百分之九十是屬于勞働者階級。靜養所，避暑地之次，尚有醫療問診所，疾病豫防等衛生設施；計一九三二年度，投資該方面的金額，幾及九五·〇〇〇萬盧布。此外，又為勞働者階級建築住宅家屋，設立學校圖書館等，支出巨額的經費。據政府公表的數字，蘇俄聯邦勞働者享受的社會賃銀，平均每人約當貨幣賃銀的百分之二十四又四，即月額平均為十九盧布。

五 社會保險

蘇維埃聯邦的勞働者，不問其業務之種類性質，報酬賃銀及契約期間如何，一律令其加入社會保險。保險的費用，雖隨業務種類而別，但概由僱傭者方面負擔全額，不用被保險者破費分文。社會保險的給付，區別為扶助金及臨時救濟金。勞働者如因作業中發生事故，因而致永久不能勞働者，可以享受同前賃銀的全額；其計算標準，是平

均事變前三個月的貨銀數而決的。因病致永久不能勞動的，按月支給十八盧布生活費，如無醫療費必要者，給以月額十二盧布的救濟金。又，病人如能從事比較輕易的工作者，按月額九盧布的扶助金。失業勞動者——目下無有——規定給付月額二五乃至三〇盧布的生活費。其他，兒童之產生，養育，死亡等，也規定支給若干扶助金或救濟金。社會保險的資金，依照番盧布計算，一九二九年總額是一二五·八〇〇萬；一九三〇年是一七六，〇〇〇萬，一九三一年是二五七·三〇〇萬。保險者人數，一九二九年是一一六〇萬，一九三〇年是一四四〇萬，一九三一年是一六六〇萬。

六 職業組合

蘇維埃聯邦的勞動組合，稱謂職業組合；該項職業組合的數目，現在是四十四個，組織于產業的各個部門。勞動者雖然並不強其加入組合，可是因為組合員能夠享受種種特殊利益的結果，所以不啻就近于強制的性質。外觀上，職業組合的機構，與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組合，是大致相似的；不過從牠的機能及目的上來說，就有非常不同之處，這也許是根據蘇俄國家本質而生的當然的差別吧！詳細點說，職業組合雖然不是國家及黨的直屬機關，

可是牠與國家機關並立，構成蘇俄獨裁制有力的支柱。因此，蘇俄聯邦的職業組合，就不像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組合那樣，當做到抗雇主方面的鬥爭手段；因為壓根兒在勞動階級專政的國家，支配的勞動階級與國家機關之間，是打成一片而無所謂鬥爭的。關於蘇俄制度下勞動組合的新機能，即在共產黨幹部之間，也有當初尚未充分認識的人士；例如考茨基，他就以為勞動階級政權樹立之後，完全不需要勞動組合的存在。關於這一點，考茨基是反對主張存續一九二一年勞動組合的列寧的見解，而以勞動組合的本質，堅決認為勞動者階級鬥爭的解放手段；殊不知蘇俄制度下的所謂職業組合，與其當做勞動者擁護階級利益的手段，無寧說是作為國家機關來得更有重要的意義，這種新的事實，是他當時完全沒有想到的。湯姆斯基 (Tomski, Michael 1880) 也是依然固執着勞動組合是階級鬥爭機關的見解，對於蘇俄制度下職業組合的新機能，始終說不能了解。他以為職業組合既以擁護勞動者階級利益為其當然的權利，本來的義務，所以要是他們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即便是對方是國家的場合，也是應該毫不躊躇，訴諸總同盟罷工的手段。信然，在新經濟政策實施的時代，即在蘇俄聯邦的内部，也沒有私的資本主義殘滓的存在，

因此勞動組合也尚有與之鬪爭鬥爭的必要，所以考茨基，湯姆斯基的見解，就不能一概斥其錯誤。不過，自從五年計劃實施以後，事情就為之一變；于此湯姆斯基之受排斥，恐怕是活該如此。今日蘇俄聯邦職業組合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擁護勞動者的階級利益，防衛國家的榨取，而是涉及軍事，政治及經濟的全分野，強化勞動階級獨裁制這一點。不待說，職業組合關於勞動者雇傭，就業及決定賃銀等事項，它是與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組合相彷彿，盡着並無大差的機能；可是蘇俄聯邦職業組合最顯着的特色，即在帶有政治，軍事的性質。詳言之，即是職業組合，設立各種國防團體，射擊團體，半軍隊的體育團體等，助成其飛躍的發展。構成著名的國防飛行化學協會之組織的中堅

分子者，亦即職業組合的組員。此外，職業組合又于社會福利方面，實着相當驚人的活動，而訓練勞動階級教育的主要任務，也是由職業組合相當的。

本此目的，在蘇俄聯邦到處的工場，設立着勞動者的俱樂部。此等俱樂部，對於勞動者的社會文化生活上，頗占重要的功用。俱樂部中，有通俗圖書館，讀書室，體操場等附帶的設備。其他，職業組合，又于大眾之間，努力根絕文盲者，或是利用設置運動場，召集體育競技會等，圖謀勞動者體質的向上，或是發行新聞雜誌，啓發勞動者的知識，故其活動分野，是多歧多端的。總而言之，職業組合這樣廣範圍的活動，其目的在求于勞動大眾之間，徹底散佈國家成立基調及其指導原理的共產主義的精神罷了！

(未完)

「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可以實行麼？(下)

梁子範

(一) 節制資本

我們先用民生主義的字句，大體看看「節制資本」的意義。民生主義第二講說，「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

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何以要節制私人資本呢？「是要用一種防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是也，其計畫已詳於建國方略第

「卷之物質建設。」怎樣去發達國家實業呢？「這三種大實業，（鐵路，工業及礦產）照我們中國的資本學問和經驗都是做不來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的資本，……又不能不借用外國有學問經驗的人材，來經營這些實業。……這三種收用，（鐵路，工業，及礦產）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享，那麼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

我以為節制資本的理想在中國是否可以實現，完全繫於兩個問題：

（I）外國的資本是否可以借得來？

（II）公私經濟究竟孰優孰劣？

我們先仔細討論這兩個問題

（I）外國的資本是否可以借得來？

投資事業的第一個條件，在乎投資者有信心，在乎他覺得他的投資安全；這是在國內和國際投資都可以時常觀察的現象。中國幾個資本家，把他們的資本偏偏喜歡投在租界裏的事業，雖一方由於他們的愛國心不強，而地方實在由於他們覺得投資中國他地的事業不大安全。德國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零吸引了不少的外資，因為外國的資本家那時對德國的政治和實業有信心。一九三一以後，那些資

本家相繼把他們的投資撤去，因為德國的政治和經濟情形使他們感覺不安。中國現在的情形怎樣？政治未上軌道，社會不安頓，經濟事業都站在風雨飄搖的當中，這種情形能够吸引外資麼？眼未離開現實的人，誰也不能說有那種可能。

在投資者有信心以外，還要看投資事業有沒有利潤的希望。那要興辦的實業的利潤希望愈高，吸引外資的力量愈大。反之，誰也不肯把他積得的資本送到賠本的事業裏去。中山先生之實業計劃裏所要興辦的實業怎樣？他要辦三個大商港，他要修十萬英里鐵道，他要開運河，他要興辦鋼鐵業和礦業等。這種舉辦對中國的工商業當然有益處，然而對投資的外國人却未免太苦，因為這類舉辦或根本就沒有大的利潤可圖，或在十年三十年以後才許有點利潤。伶俐多智的外國資本家是不會進我們的圈套的。

經濟投資，沒有希望，只有政治借款有時可以引動外國人。屬於政治的事，我們暫時不談。

（II）公私經濟究竟孰優孰劣？

這裏所謂公經濟，是指着國家或地方政府所經營的經濟事業；所謂私經濟，是指個人或個人集和起來辦的工業企業。

私人經濟的原則，在迎合消費者的慾望和需要，去製造或運轉物品，從中謀利的。營業有沒有利潤，是各個企業或商店的生死問題，所以企業家和商人都兢兢業業的去整理他們的營業以加增利潤。他們一方面要力求出品好而且賤，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他方復利用新的發明新的技術等等去減低成本，以超出同業的競爭。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是私人經濟的秘訣。這種息息不休的推進力，是過去一百年經濟進步的源泉。至於求利潤的邪路以及弊端，在有力量量的政治之下是可以制止的。政治上軌道，經濟是隨着政治走的。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 以及

Manchester 派的錯處，大概就在沒認清這一點。公經濟是當以社會大眾的利益為原則的，冷眼看起來，似乎很討厭心，實行起來，却有好多難免的弊端：

第一：在官吏式的營業裏，不說營業者沒有企業家的膽識和經驗，他們也處處掣肘於政治，沒有全力以應付營業的可能。

第二：公經濟是以公衆利益為原則的，但是公衆利益有好多時候不容許你量。一條長而且廣，對轉運很利便的馬路，誰說對社會沒有利益？但這種利益誰能去直接量？誰能說這條馬路賜的利益比去年高？而且高多少？

第三：對公共有利的營業或興辦，往往不是在短時間可以收效的。開海港，修運河，在十年二十年之後對公衆也許是很有利益的事，但目前是決乎看不到的，計算錯了，白費了開關費，也是常見的了。

第四：因為公經濟的利益往往不容許量，而且多在好久以後才可以實現，加上管理的不得法，所以營業的時候沒有一個實際的把握，所以就生出第四個大毛病，那就是公經濟多流於不經濟。

因為公經濟有這許多病端，所以公共事業近來多趨於取長補短的公私合營制。

總之，中山先生的實業計畫是不會實行的，試比較最近的「四年計畫」和從前的「十年計畫」，就可以看出了。整個的中國實業問題，當然不是本文所能涉及的。

中山先生對中國民族的功績，是千古照著，永不磨滅的事實，假若他還生在今日的話，中國的諸種問題也許都可迎刃而解。但是他講三民主義是為救國的，假若他知道，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不足以解決民生，不足以救國的話，那他一定會說：高尚的目的是不當移轉的，成事的方法是，並且應當隨着環境的需要而變動的。希冀國人

和國民黨今後能體貼中山先生的真正目的，去努力作救國的大事，不要再拘泥紙上的文字，而貽誤國家的百年大計

。最後我用希臘哲人一句話，結束這篇文章：『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完)

歐美勞作教育的沿革(上)

邱椿

西洋勞作教育，導源於希臘和羅馬；據說當時的機械師，建築師，庖師，理髮匠等都有專校培養。中古時代僧院學校中亦略有勞作教育的萌芽；其課程除文法，聖經，修辭學等外，還有木工，銅工，紡織，成衣，建築，農藝等科。但中古以前，缺乏史料，其詳情殊難考證。茲從文藝復興時代說起，分七個時期，敘述歐美勞作教育的沿革如左。

(一)烏托邦時期的勞作教育。關於理想社會的名著，莫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當首屈一指。在這烏托邦內，每個公民都要熟練一種技藝和一種農作。教師常領導學生到農場和工廠內，觀察他人工作並隨時參加。拉貝來(Rabais)在其理想教育制度內，規定教師應領導學生觀察鑄鐵，打銅，琢玉，雕刻，做金器的歷程；應使學生隨時留意織布匠，鐘表匠，成衣匠，印刷匠的工作。在校內，學生要學習木工，鐵工，塑像，農藝等。他以為這種教

育有三種教育價值：(1)增進學生對於產業的趣味；(2)豐富兒童的多方的經驗；(3)強健兒童的體格。培根在其新亞達蘭提司(New Atlantis)內，主張國家應設立研究院(Solomon's House)，實驗工業製造。關盆尼拉(Campanella)於1610年刊布其太陽城(City of the Sun)。在此城內，有六大畫壁，為實施成人教育的場所；在第六個畫壁上，張貼種種工業畫片。城內最精良的技師常受政府任命，為全城學徒的教師。參觀工廠亦是學校內的正式課程之一。在安突里(Andreae)的克里提安諾波里司(Cristianopolis)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男生上午上課，女生下午上課；保姆和學者都是他們的教師。學生半日讀書，半日做工；所做的工作大抵為手工，家事，科學實驗等，每個學生可根據其天才以選擇職業。』在其提阿非亞司(Theophrastus)一書內，他主張學校應使學生熟習多種手藝，以訓練其機械的技能。這些烏托邦學者只標出

勞作教育的理想，但並無具體的計畫。

(1)十七世紀的勞作教育。甘宋尼烏司 (Comenius) 在其大教育學 (Great Didactic) 內，主張設立四個職業學校，並介紹工藝和農作於普通學校的課程之中。他以為勞作教育有四種價值。第一，牠能適應兒童心理上的需要。他說『兒童歡喜將物件從某處搬至另一處，歡喜佈置傢俱，歡喜製作或拆放一件東西，歡喜結繩解繩等。這些都是兒童歡喜做的事情。這些活動都是心靈要表現於生產的徵象；我們不應阻止他們，而應鼓勵及指導他們。』第二，勞作教育能指導學生選擇其職業。他說：『學生應學習機械工藝最重要的原則，使他們在一方面能熟悉工業社會狀況，在他方面又能發見學生對於某種職業的特殊天才。』第三，勞作教育能增進學生健康。第四，牠能養成勤勞，忍耐，好動的習慣。甘宋尼烏司是近代大教育家，其理論對於後來勞作教育之發展，有頗悠久而普遍的影響。

同時「百科全書」派的教育家，反對形式的古典的課程，而主張將工藝一科介紹於課程中。這派代表為摩爾呵夫 (Morhof)。依他的意思，教育應是多方的，課程應包含文化中一切要素。他以為課程可分為三大部：即自然，歷史，工藝。他所謂歷史，即是社會。後來蘇俄教育家分

課程為自然，社會，勞工三大部分和摩爾呵夫可算不謀而合。他又主張學校應搜集種種工業上器具與機械。

唯理主義者也提倡勞作教育，這派代表為笛卡兒 (Descartes)，來布尼茲 (Leibnitz)，洛克 (Locke)。笛卡兒主張設立工人學校。依他的計畫，工人學校應建築許多大廳，代表種種工業。各個大廳有一個博物館，一個研究室。在博物館內，陳列種種工業器具與標本。每個研究室內有一教師，其職務在解答工人疑問和指導其工作。笛卡兒弟子維格兒亦力倡勞作教育，他說，『學生應在工作 and 行動中求得智慧，知識與能力。知識不應自他人說話中尋找，而應自手工中求得之。』這段話頗能發揮由行而學的原則。

依來布尼茲的主張，凡不能從事理智工作的學生，應使其學習工藝。他以為強令貧賤低下者讀書，在學生為一種痛苦，在國家為一種損失。他們應學習技術，才能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在其法律新教法一書中，他主張工藝訓練是普通教育的一個要素，自十二歲至十八歲的青年都應學習手工。

洛克以為手工教育不但有益於平民，而且有益於貴族。他說：『勞作教育有用權利益。第一，技能的本身是有價值的。第二，勞作有益於健康。』(關於工藝學習問題，

畜牧，木工等。他可以指導園丁的工作，可以製作許多有用的器具。但製作並非主要的。我的主要目的，是使紳士們在深恩苦學而感覺厭倦時，可暫時轉習手工以增進其健康。』

在十七世紀後期，英國教育家愛培根和甘米尼烏司的影響，都極力鼓吹勞作教育。杜里 (Dury) 說：『學習工藝和科學，對於各種人民都有利益：(1) 平民學了，可從事於手藝和卑賤的工作；(2) 有知識者學了，可發展科學和訓練青年；(3) 貴族學了，可處理其平時和戰時的公務。』在革新的學校一書中，他主張從十三歲到十四歲的兒童之教育，應特別注重職業訓練。

當時還有一個教育家，名物提 (Pett)，也是英國勞作教育的推動者。他主張設立一個「文學工廠」(Literary Manufactory)，其目標在使『學生能讀，能寫，並能謀生』。在這個新學校內，富貴子弟都可入學；實物的提示先於書本的閱讀；全體學生，不管其家長社會地位如何，都要學習工藝。至於應學習的工藝之種類有圖畫，雕刻，鑲嵌，建築，造船，染色，鐘表製作，儀器製作等。他又主張編輯一本工業大全，詳述種種工業的歷史，機械，歷程，情況，報酬等。青年讀了這本書，可選擇其情願從事的職業。這是一個極好的建議，現代職業指導家也有提議

編輯這類書籍的。至於勞作教育的價值，他以為平民子弟可養成勤勞的習慣，富家子弟可獲得一種消遣的方法。那時詩人考來 (Cowley) 也鼓吹勞作教育。他在一六六一年刊布其哲學院計畫。該院分若干部，工藝是其中的一部。工藝部教授要研究各種工業製造的秘方和分析種種工藝品的成分。

這些教育家的理論在美洲引起同樣的教育思潮。哈佛大學校長郝爾 (Hollis) 曾久居英倫，感受該地教育家理想の影響，於一六七二年回美時，即建議哈佛大學應建設廣大花園和機械博物院。一六八五年柏德 (Bartholomew) 刊印其辦學計畫，他主張學校課程應包括各種工藝；工業和普通教育應完全合一。他說：『男生應授以手藝秘方：如打鐵，造鐘，紡織，做鞋，和他種技藝的秘方。凡學校所能教者，都應教給學生。女生應授以紡紗，織布，縫手套，做襪子，針工，編織草帽和籃子等，及其他學校能教的技藝。』他又說：『學生在上午應以二小時學習閱讀，書寫，筆記等；以二小時學習其所願學的美術、技藝、製造的秘方等。在下午，學生有二小時可吃飯和休息；有二小時可從事於其職業的工作。』這是他的工業與教育合一的具體計畫。

弗蘭克林 (Franklin) 在其學校計劃內，頗注重工業史一科。他說：『關於工業史的知識是最有用而最有趣的。商人學了工業史，更瞭解商品的質地；工人學了工業史，可利用新機械，新混合品，新原料以改善其工作；新製造法和新耕種法亦可由工業史中得着若干暗示。』在其改良潘錫外尼亞 (Cassylvania) 教育意見書中，他主張生物學的教學應與農作取得聯絡。他說：『教生物學時，應同時教授園藝，接枝，種植；應領導學生參觀附近最優良的農場，觀察其生產方法。農藝的改良是有助於社會全體的；農藝的技能至少是無害於任何個人的。』他又主張歷史的教學應與工藝有相當聯絡。教通史時，應同時教商業發達史，工藝發明史，工業革命史等。學生讀了這些歷史，對於工藝和勞作自然發生更濃厚的趣味。

(二) 十八世紀初期的勞作教育。十六世紀有勞作教育的理想，而無具體計畫；十七世紀有具體計畫，而未嘗見諸實行。至十八世紀初年，教育家始介紹手工一科於學校課程之中。勞作教育真正的開山祖要推德國的佛蘭加 (Frankle) 和森勒 (Semler)。佛蘭加在哈拉 (Halle) 創設了貴族學校。在這個學校內，手工不是必修的正式功課，而是餘暇的選修學科。學生拿手工真一種娛樂，為一種有益

的運動。有時教師嘗領導學生參觀商店和工廠。該校又購置數架機器，並僱用一工人，教學生做木工、鐵工等。後來又增設鑄銅，磨石，雕刻等科。至於勞作的價值，佛蘭加以為有五種：即強健身體，善用餘暇，鼓勵創作，訓練眼手，獲得正確觀念等。這個學校後來逐漸發展，稱為佛蘭加學院，也可算是全世界第一個勞作學校。

當佛蘭加在哈拉創設貴族學校的時候，森勒在同一地方創設工人子弟學校。他曾建議於市政府，設立「數理技藝學校」；市政府雖嘉獎其建議，而未能實行。於一七〇八年，他在家中開辦工人子弟學校，是時入學者只有十二人。他每週教課二小時，其內容為數學，機械學，手工，園藝等。翌年他介紹手工於普通課程之中。他以為手工不但有職業的價值，而且有普通陶冶的價值。這個學校因經濟困難，不久即停辦；但曾引起很普遍的勞作教育思潮。一七三八年森勒又重新開辦其數理技藝學校。一七四〇年森勒卒，學校又停辦。森勒創辦的學校是德國實科學校 (Realschule) 的鼻祖。

森勒死後，能繼承其遺志而努力於勞作教育之發展的，首推赫克 (Hecker)。他於一七四七年創設「經濟數理實科學校」其目標『在使那些不能讀書而頗有經濟，將地

，做工的才能者，得發展其天才，並獲得初步的職業訓練。
。』赫克學校的組織和課程都頗複雜，對於後來勞作教育的推廣有很普遍而悠久的影響。

(四) 十八世紀後期的勞作教育。 這個時期有一種自然主義和民本主義的思潮，對於勞作教育運動也有極大的影響。盧梭在一七六二年刊布其愛彌兒，對於勞作的價值大加發揮。他以為勞作教育可打破貴族階級歷來輕視手工的惡習；可以協助青年謀生；可以養成獨立自尊的觀念；可以訓練思想，增進健康，供給娛樂等。勞作教育的主要目標，不在職業訓練，而在文化的陶冶。他說：『我們要學做工人，尤其要學做堂堂地一個人；學做堂堂地人難於學做工人。』依他的意思，普通教育應和職業教育並流而行。

巴斯豆 (Basedow) 創設「慈幼院」(Pflanzthopium)，將盧梭的關於勞作教育的理想實施於其學校。在慈幼院內，學生要熟練木工，鐵工，紡織等技藝，要隨着教師參觀工廠商店。第六年級的學生每季要和農夫同住兩星期，以獲得農業上的經驗。他們要野宿兩星期，在海口商店

及孤兒院住宿各一星期。最後他們要在法院內參觀一月。

巴斯豆弟子沙爾斯曼 (Salzmann) 在施耐分達爾 (Schneppenthal) 又創設一慈幼院。他的課程分為三部：形式訓練，體育，手工；頗似現代葛雷制 (Gray plan) 的讀書，遊戲，做工。他以為勞作教育的實施可減少學校訓練上的許多困難。他說：『如果教師使學生於讀書完畢時熟練其手工，訓練上許多問題都隨着解決了。教師不必要為學生找娛樂，學生會自求娛樂。教師不過是一個旁觀者，一個顧問。學生所得利益是不勝枚舉的。第一，學生活動的本能可以滿足，他們不會因活動受壓迫而倒行逆施。第二，學生獲得最純潔而最真實的愉快，即逐漸接近與達到其目標的愉快。在平常教育方法之下，學生只是盲目地服從他人的思想與指導。在勞作教育之下，學生自己形成其觀念，並發明工具以實現其觀念。』這段話是極合現代教育原則的。沙爾斯曼的同事波拉沙 (Basche) 則主張以手工為學校一切活動的中心。這種主張和現代勞作學校的理想完全吻合了。

(未完)

編者後記

獨立評論 第八十二號 編輯後記

△本期裏的一篇論「歐美勞作教育」的文字是北平師範大學教育學教授邱大年先生從美國寄來的。他受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補助，現在海外放查「勞作教育」，這是他要著作的一部專著的一個楔子。

△「蘇維埃聯邦之勞動政策」的原文見於日本的「社會政策時報」的十二月號。

△「工程師的任務」的作者「詠寬」，多數讀者自然認得是翁文灝先生。他說，他自己不很得意的文字就用他的別號；更不得意的文字就用他種筆名。可是我們總覺得，他無論用什麼名字，他的文章沒有不值得細讀的。

(適)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列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圖書

評論

目要

- 陽明焜：滬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
- 阮毅成：民主議會政治下行政府首領權力之擴大
- 趙奉生：張虹君譯近世政治思想史
- 陳恭祿：張德堅總纂的賊情彙編
- 李灌果：海士蒙合著近代史之兩種譯本
- 張德昌：中美兩國文化的接觸
- 沈述材：論實著中國文學史大綱
- 賀永年：盛成著我的母親
- 李嘉言：王禮謫著李長吉評傳
- 梁實秋：傅東華譯失樂園

價閱訂

本期零售大洋三角
國內全年二元二角
國內半年一元四角
國外全年四元八角
第一卷合訂本上下兩冊特價參閱

社址：南京將軍巷七號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朝鮮	每月一元
租界	每月八角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南洋	每月一元二角
歐美	每月一元五角